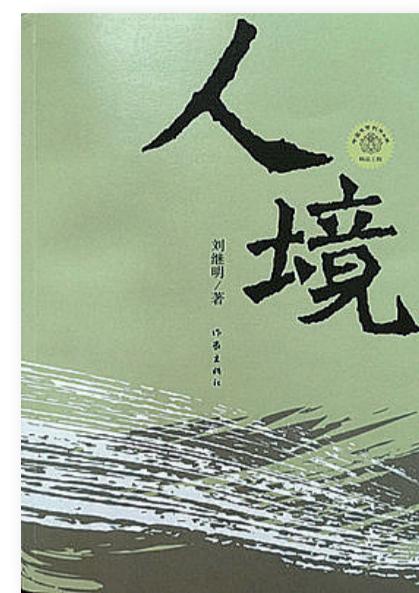


# 从中国的大地和现实出发

□冯 敏



《人境》是刘继明耗时多年推出的长篇新作,小说以一种极具代入感的叙述,全方位、立体化、“共时性”地描述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沧桑巨变,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这种描述不是当下许多作品中常见的碎片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而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性的反思,体现出一种思想的气质。《人境》是一部有“声音”的小说,众声喧哗,有如交响音乐中的“总谱”,同时又显示出一种“复调”结构:既有来自外部世界多重声音的相互交响、相互纠缠,相互渗透和相互博弈;也有来自作家(作品叙述人)内心两种声音的斗争和挣扎。小说上部写的是人与土地共处的“大世界”,下部写的是文人圈子的“小世界”,彼此构成了一种对应和对话关系,使我仿佛看到一位风尘仆仆的思想者在登上理性的山巅之后,又向着感性的沃野做深情的回归——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凯旋。正因如此,刘继明才有了对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独特表达。他对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有着天然的向往和敬畏,有对江汉平原上那个叫神皇洲的小村深刻的眷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奋斗着的人们,以及大自然中的生灵与草木,都经过了作家情感的过滤,如同地毯上凸起的花纹,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譬如那叫大林、小林的两只小刺猬,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仅仅是讲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塑造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在我看来,塑造人物比讲故事要难得多。在以往写农村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一提起《创业史》就会想到梁生宝,一提起《艳阳天》就会想起萧长春。这些以小说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境》的主人公马拉,对上述人物形象既有继承更有发展。梁生宝和萧长春是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体会到阶级地位的历史性变迁,又在经济制度的变更中辨清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他们身上极大地焕发出主人翁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而马拉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经历从亢奋到失落、从受挫到思考的命运的沉浮荣辱。比较而言,无论梁生宝还是萧长春,都未经历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物命运的沉浮和人性的嬗变,所以马拉这个人物比梁生宝和萧长春显得更加丰富和立体,也更具悲剧色彩。在马拉上小学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哥哥马珂和女知青慕容秋。哥哥的英雄主义气质影响着马拉,慕容秋的书籍培养了他的阅读习惯。马拉在替哥哥与慕容秋传递

书籍和信件的过程中,完成了爱情启蒙。当马珂为抢救生产队的种粮而英勇牺牲成为烈士之后,哥哥一直是他奋斗前行的动力,可以说,哥哥对马拉的成长和人格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

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对世界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但问题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在当今中国,知识精英们在许多时候参与了各项改革的蓝图设计。马拉以边缘人身份感受着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这使他比精英们多了一份来自草根大众的“感同身受”。回乡创业是马拉理性思考的结果,他将全部热情投入到乡土中国的再造,而神皇洲就是他的“实验基地”。在马拉身上,既有欧洲理想主义者的道德情怀,也一脉相承着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侠义精神。马拉在神皇洲创建“同心合作社”的实践启示我们:在中国,土地问题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未来的中国也离不开土地问题。专业合作社作为中国农村方兴未艾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正在重新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这必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马拉的悲剧和他的启蒙老师迟永嘉很相像,他们都是先行者——迟永嘉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马拉是再造农村的先行者。先行者往往因为力量薄弱而遭受失败,然而,他们却对后来者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马拉这个形象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个思想的先知先觉者,也是个脚踏大地的实践者。

(《人境》,刘继明著,作家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如果说马拉的启蒙老师是自由主义者迟永嘉,那么对慕容秋世界观影响最大的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马珂。马珂是生产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慕容秋是省城里下乡插队的知青。慕容秋喜欢马珂积极上进的实干精神,同时也认同马珂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信念。慕容秋身上知识青年特有的精神气质,也深深吸引着马珂,他从慕容秋给他推荐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精神营养,两个人从志同道合走向了情投意合。不幸的是,一场大火终结了两个人的初恋——马珂为抢救集体财产而牺牲了。生活中的这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慕容秋的命运。全国恢复高考之后,慕容秋考上了省城一流大学,并留校当了老师,其间她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随着慕容秋生活面的展开,《人境》下半部也渐次展开,以慕容秋的遭际牵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小世界”。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充满了各种名利的争夺,充满了各种小气的行为,甚至龌龊的举止。作为一个心想做学问而远离校园政治的慕容秋,很难独善其身,有时不免随波逐流。然而在接触马拉以后,慕容秋对自己的生活做了深刻的反省。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和研究方法,重新回到神皇洲,和马拉一起探索农村合作经济的新课题、新道路。

在《人境》里,迟永嘉和马珂并非贯穿性的人物,他们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是这两个人物深刻地影响着马拉和慕容秋。不同的是,先知先觉、多才多艺的迟永嘉死于利己,单纯执著、信仰坚定的马珂死于利他,而深受迟永嘉影响的马拉和深受马珂影响的慕容秋,却在新的思想起点上殊途同归——他们都要告别旧我,走向新我。

总之,正因为刘继明把主观世界融为一体的故事,才使《人境》达到了历史与美学的高度统一。小说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结束,书中许多人物的命运走向都处在变化之中,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一样,充满了危机也孕育着希望。正如刘继明在后记里写的那样:“30多年过去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经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潮流的冲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任何花哨迷乱的外衣都无法遮住文学内部的苍白和危机。当下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放。”但愿《人境》成为一只报春鸟,使更多像刘继明这样有担当、有理想的作家,从中国的大地和现实重新出发,去迎接新一轮文学和思想的“日出”。

(《人境》,刘继明著,作家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李娜整理的《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在北京出版引起极大关注,京沪两地举办了多场研讨会,也有一些相关论述发表流传。事实上,该书台湾版2014年5月甫一出版,就颇受读者欢迎。《无悔》跨越近百年时空历程,既是革命者陈明忠的生命史,也是台湾不同时代政治压迫与庶民抗争的历史记忆。

陈明忠特殊的革命经历与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无悔》超越一己的生命体验,富有历史感、时代感与公共性。他是诸多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吕正惠在序言里写道:“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70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

赫顿说过:“不是历史能否发掘回忆,而是回忆给历史留下了什么。”陈明忠的口述使历史事件有着丰满细节、现场温度与情感波澜。《无悔》以无数生动例子告诉读者,日本殖民统治才是台湾人悲情的缘起,日据下台湾人是二等公民,毫无尊严可言。与台湾不少知识者类似,陈明忠的民族意识萌发于殖民歧视,自认为是日本人的他在高雄中学被叫“清国奴”、被打、被群殴,从此走上反抗道路。民族歧视令他意识到压迫结构的不合理,对于地主佃农的阶级关系开始反省,加上阅读左翼书籍,渐渐生发出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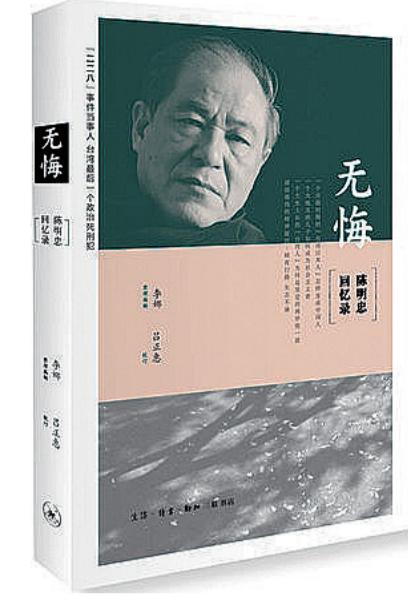
《无悔》呈现的诸多殖民体制压榨农民服务战争的事例,破除了殖民现代性幽灵。日据时期,农民无法自主,农民反抗运动不断。赖和、吕赫若等人的作品也曾不遗余力地表现了彼时农民的挣扎与反抗。

台湾光复,民众热烈欢迎祖国军队。可惜,当时国民党腐败统治导致1947年

“二二八”事件爆发,作为台中农学院学生,陈明忠参加了谢雪红领导的武装部队,同时不忘保护外省老师。何为真实的“二二八”?事件起因是官民冲突、阶级矛盾,彼时整个中国类似抗议事件风起云涌,并非只有台湾发生此类冲突。国民党接收失败与“二二八”,使台湾进步青年开始左倾,寄希望于“红色中国”。“二二八”促使红色血脉在台湾迅猛发展,陈明忠即是“二二八”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组织的。

陈明忠坦言,来大陆时,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回答:“我是红的。”反共意识形态与“台独”史观影响下的历史记忆颇为盛行,左翼民族主义的红色记忆却湮没于历史尘埃,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李娜认为,“85岁的陈明忠先生不会标榜功绩,不会在意一己得失,更不会‘悠然抒怀’,回忆,依然是为了现实的斗争”。《无悔》一方面针对“台独”史观,一方面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叙述,由丰满生动的细节搭建起一个真切昂扬的红色历史叙述。

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大肆肃清岛内左翼力量,连日据时期赴大陆抗日的钟浩东都被国民党判处死刑。陈映真认为50年代的白色恐怖“就国内而言,它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阶级内战的延续。就国际而言,它是战后美苏二



## 时代见证与历史的再叙述

□陈美霞

体制对立下,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反共大协作体系布局下的一个环节,使无数无辜群众被牵连被冤枉”。不少人入狱前懵懂憧憬,入狱后的政治学习与受难者的互相请教反而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为此他们自言“监狱是大学”,甚至互称“老同学”,此前有一本受难者访谈录即名为《绿岛老同学档案》。

牢狱生涯成为精神升华之所在,于陈映真亦如此。牢狱生涯同样令陈明忠更加坚定左翼的理想信念:“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和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无悔》既是个人抗争史,

也是台湾现代史的缩影。历史叙述作为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族群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悔》以口述回忆的方式,通过个体命运与时代历史的碰撞,呈现不同情境下台湾左翼势力的生发与衰微,揭开国共内战期间台湾青年参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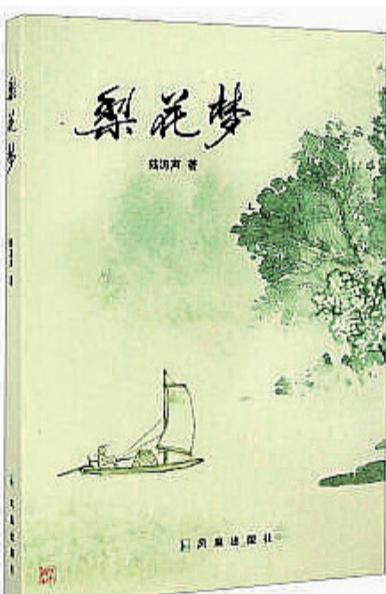
陈明忠始终不忘自己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出狱后担任厂长依然为女工争取权利,70年代党外民主运动印刷传播左翼书籍与大陆资讯,为此再次入狱且备受刑求。保外就医后,他积极领导统左派的组织建设。面对屡败屡战的艰难历程,陈明忠自言:“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福柯曾提出历史叙述总是代表其赖以生产的文化,也依赖居主导地位的——包括政治的——表达形式。80年代初,陈映真小说《山路》(《铃铛花》)《赵南栋》就突破禁忌书写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蓝博洲在《帆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等书中对白色恐怖牺牲者的挖掘更是不遗余力。毋庸置疑,《无悔》延续了陈映真、蓝博洲重建台湾“统左派”革命历史叙述的实践。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陈明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4月出版)

## 新人故事与文学启蒙

□许植基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公众开启了一道希望之门。“五四”文学用新文化的人生观价值观感受、理解、思考衡量、评价历史、社会和人生,批判旧生活,憧憬新生活。鲁迅的《阿Q正传》开启了乡土文学对农民悲惨命运和愚昧精神的透视,随之便是茅盾的《蚀》三部曲、叶圣陶的《倪焕之》等多位作家作品,对现实作了细密描绘、深入剖析,催人觉醒。文学启蒙的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作家。而不久前,一位佛门高僧却对一位作家感慨说:“这30多年,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流进和文学的名利化、商业化的蔓延,文学的启蒙品质渐被消解,许多作家的迷惘也纵容了人生迷惘……”这显然深怀忧患的醒世之言。

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江苏作家陆涛声继承鲁迅精神,长期倾情农村,甘守寂寞,关注现实人生,坚持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从文化角度对农民劣根性——即小农意识当代性表现作审视与解析,痴心地担当着呼唤觉醒开启民智的责任。归根结底,当前各种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几乎都与小农意识有关,是改革前行的阻力。而陆涛声的长篇小说《梨花梦》,通过男主人公柯正华之口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大农民”。这显然是对小农意识的革命。

长期以来,小农意识的短视、狭隘、虚荣、好走极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了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小农意识,不仅仅是现实中农民身份的人有,各社会阶层甚至号称精英的人也有。《梨花梦》描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一批农村年轻人走出高中、大学校门又回到农村。他们有一定文

化知识也有新的视野,但又或多或少带有小农意识,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多种观念撞击,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目标,也经历了不同爱情婚姻的悲喜剧,展示了不同的品性和灵魂:李亚娟是村支书的女儿、柯正华的高中同学,一直明恋柯正华却遭父母反对,她能抗争,却又有权力的优越感,怀有用父亲权力庇护柯正华的心愿,然而这恰恰犯了柯正华反感权力干预的大忌;她最终被父母安排嫁给乡里首富之子,满足于逛商店购物的享受,安于依附而放弃自我价值实现。柯正华同学蒋惠东,学了钣金冷作技术在工程队当技工,收入并不低,却羡慕工头轻松赚大钱、高消费、有情妇,弃工“经商”,臆想依赖权力赚钱而讨好官员,为维持当“老板”的虚荣面子,盲目追逐时髦,然则屡经营屡失败,最终陷入困境。乡副业办副主任杨志远,利用经济改革规范的不完善,大搞权钱交易;还通过欺骗、陷害等手段,掠得了陈玉妹的“爱情”;行事大胆疯狂,有流氓无产者习气。树苗供应商吕荣坤,性格豪爽率直,但要面子好做老大且易轻信,遭暗算而损失惨重。当民办教师的玉妹爹,因工资低,见邻居赚钱而心不平衡,为另寻财路一度不专心于教学。没文化没技能而贫穷的土根,当过兵在首长身边服务过,意外得到老首长关照,“采购”煤炭轻松发了家,便觉得有了地位有面子,许愿帮玉妹爹找干校说情,安排树苗销路。土根的马脸老婆,因暴富而得意忘形,无知、刻薄,竟对当教师的玉妹爹一家颐指气使……这些人表现了不同的人性弱点,根源都脱不开小农意识。

然而,小说中更着力刻画的,是陈玉妹和柯正华两个艺术形象。

男主人公柯正华从小受到“右派”父亲和大学教授舅舅的熏陶,读中学时受民族资本家沈九如先生资助家乡办学的情怀感染,读大学时又被爱国华侨陈嘉庚爱国事迹感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畜研所,因遭遇不公而辞职回乡养鸡。对于大农民,他的理解是“有文化,有见识,有气度,有教养,有担当,眼光能看大局,视野能及世界”。他以当“大农民”自勉,他按市场需求规划发展,培育新品。曾几次遇到刁难,在屡经挫折中不断发展;他还计划把养鸡场改建为科研、饲养、营销中心,探索出一条农村养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新路,让农户代养方式帮助周围贫困农民致富,从一家到30多户,计划达到上千户。他也有认识的局限性,也造成失误,然而事后总能严格自我反省,“能勇于否定自己该否定的方面,重新找回公正”。他坚持实事求是,宁可不评劳模,也不肯虚报

数字。他认为“跟风,永远找不到正道。”“退一万步说,即使政策有变,所创造的一旦不属于我个人,终究还是社会客观存在,抹杀不了,我的脚印终究留着。”这就是大农民的境界。他不断探索真理、觉悟人生,是农民队伍里对自身阶级局限的自审者、叛逆者,把农村改革当作一次人生的洗礼。

女主人公陈玉妹与柯正华本是青梅竹马,相知相惜。她当民办老师的父亲求财心切,遇危急时受到了杨志远的“救助”,迫使她陷入杨志远结下的蛛网,被他掳进怀抱。她性格软弱,有依附性,易轻信,也一度迷失于富有生活,酿成了婚姻悲剧;经历生死之劫,刷心之痛后,她从教训中觉醒,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格走向独立,并再次经受了感情纠葛与权力优越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创出自己的事业,觉悟到“幸福只是行动的热情与创造的满足”,努力创造机会帮助更多人就业脱困,最终也成长为“大农民”。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名著《怎么办?》中女主人公薇拉这个艺术形象,是沙皇独裁统治没落与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型时期孕育出来的,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薇拉是个“新人”。《梨花梦》中“大农民”产生的时间,也是改革开放带来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观念撞击与交融时期,即历史性变革的转型时期。柯正华与陈玉妹脱颖而出,是新一代农民中的觉悟者,眼光从乡村放远到都市、海外。反映了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的自我批判、自我觉醒,完成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与境界升华,是凤凰涅槃,也是破茧成蝶,是中国农民中的“新人”。这支农民队伍内部产生的自我觉醒与升华,比来自外部的批判珍贵十倍百倍。虽然在当时的农民中还不是多数,但代表了农民跟上现代文明的脚步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

陆涛声是第一个描写“大农民”的作家,突破了传统的农民题材的创作。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由人物性格决定,合情合理,真实感人,由主要情节派生衍发的情节,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无论是刻画“新人”成长,还是小农意识的现实表现,都极其用心地描写他们各自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们矛盾的心路历程,特别细腻特别精微,可读性很强。人物所作抉择,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能唤起读者与小说人物一同进入心理体验,甚至读者也会自身试作假设性抉择,总结经验、教训,获得启迪,产生觉悟。这正体现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小说中多处诗情地描写了梨花。梨花梦,是柯正华和陈玉妹的创业梦,更是灵魂自我更新的梦;其实也是涛声希望传统农民成为新人“大农民”、改善民族整体素质的梦。笔者以为,面对当代人信仰、道德、价值观的现状,当代文学应当回归启蒙传统。

(《梨花梦》,陆涛声著,凤凰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陆涛声是第一个描写“大农民”的作家,突破了传统的农民题材的创作。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由人物性格决定,合情合理,真实感人,由主要情节派生衍发的情节,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无论是刻画“新人”成长,还是小农意识的现实表现,都极其用心地描写他们各自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们矛盾的心路历程,特别细腻特别精微,可读性很强。人物所作抉择,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能唤起读者与小说人物一同进入心理体验,甚至读者也会自身试作假设性抉择,总结经验、教训,获得启迪,产生觉悟。这正体现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小说中多处诗情地描写了梨花。梨花梦,是柯正华和陈玉妹的创业梦,更是灵魂自我更新的梦;其实也是涛声希望传统农民成为新人“大农民”、改善民族整体素质的梦。笔者以为,面对当代人信仰、道德、价值观的现状,当代文学应当回归启蒙传统。

## 高莽与这座城

——评传记文学《感谢故乡——哈尔滨的青春时光》

□金恒宝

传记文学《感谢故乡》由王宏波写于高莽先生90华诞之时,解读了高莽先生在出生地哈尔滨度过的童年、少年、青年岁月。

用真实的文字书写历史,用真实的素材书写人物,还原名人和城市的真相,还原人物和历史的原滋原味,这是传记作家的责任。王宏波与高莽先生均是哈尔滨人,有着多年交往和友谊。近几年,作者在高莽居住过的地方多次考察,走访知情者,并与高莽先生面对面交流,积累了大量素材及细节,摆脱了种种虚张声势和“载之空言”的浮泛。

在《感谢故乡》一书中,作者以人为本,以真实为原则,做到了人真、情真、事真、景真,仿佛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读者真切感受到高莽先生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追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作者了解哈尔滨的历史和高莽先生在哈尔滨的经历,所以写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书中不但能读出高莽先生的气质个性,同时也能读出作者的真功夫和硬功夫,既真实可信,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哈尔滨文化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中东铁路建成时,30多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拥入哈尔滨,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哈尔滨有30万人口时,其中就有20万俄侨。王培英在《论俄罗斯文化对哈尔滨的影响》一文中说,移民们“把俄罗斯文化引入了哈尔滨,在建筑、教育、文学艺术、饮食服务、语言等许多方面,留下了俄罗斯文化符号,而变得更加精致多彩”。

由于自幼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高莽的成长与俄罗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书中,作者不惜笔墨阐述了高莽与俄罗斯文化的情缘,剖析他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原因:讲授俄罗斯文学课的女教师,本身就是俄罗斯人,总是声情并茂地将小说中的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如同她亲历一般。高莽被老师那带磁性的声音感染着,也仿佛亲身经历了老师讲述的故事情节。老师讲果戈里的讽刺剧《钦差大臣》时,乌克兰农民欢乐的场面和对达官贵人的鞭挞,让高莽和同学们笑得直不起腰。

高莽爱画画也是受到俄罗斯作品的影响,他跟三位俄罗斯画家学过油画,其中一位是列宾的学生。高莽曾经谈过:“我之所以能够与俄罗斯的文学接触,因为我生长在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外民族中以俄罗斯人最多,我就读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同学中也以俄罗斯人为主,还有乌克兰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大家在一起都讲俄语,接受的是俄罗斯文化。这从小就培养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热爱。”

《感谢故乡